

科学界动态

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反右派斗争大会

9月18—2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有四千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的反右派斗争大会。在大会上，有四十几位青年和老科学家发言。他们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的说理和五个青年右派分子展开了一场保卫社会主义的大辩论。

这五个右派分子是：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何肇、物理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项志遴、数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徐芻、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夏永年和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翻译徐志国。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他们在群众中进行点火活动，散布和制造反动言论，乘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他们除了支持社会上其他右派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外，何肇并且把自己装扮成“科学家”的代言人，诬蔑党没有给科学事业以必要的“阳光和空气”，“没有依靠科学家”所以“把科学院办糟了”；攻击党是“外行”，“不能也不应当领导科学院”，反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路线；捏造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间“制造隔阂”的谎言，企图挑拨离开科学家和党的关系。被物理研究所右派分子们奉为他们的“理论家”的项志遴，则大肆叫嚣“社会主义阵营不够民主”，“大民主是反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他曾经二次去苏联学习，却不惜颠倒黑白，散布“苏联农村接近破产”，“农民不起来反抗是由于秘密警察的统治”等等谣言，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各个方面进行恶毒的诬蔑咒骂。他宣扬所谓“业务即政治”的口号，故意歪曲“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捏造出“既有社会主义存在，就会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谬论，借以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企图迷惑青年知识分子走上脱离政治、从而被右派分子所利用的道路。徐芻则在整风期间，到清华大学师生中进行煽动，诬蔑党“下层还有好的，上层就腐化了”，歪曲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的政策。他还经常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的无耻宣传；几次在厕所里写贴反动标语。徐志国的个人野心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梦想十年之后，能够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要吞并“朝鲜、蒙古，甚至日本”；由于他的个人野心不能顺利实现，因此就逐渐发展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的仇恨，认为自己“每天

受着鞭答”，“命运被人所控制”。他诬蔑今天“中国人民是遭受着苦难的折磨”，戴着“苦难的桎梏”；并且说党是“用主义来吃人”，使得“被噬者噬之无怨”。他声称他的决心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要由他这个“天生的领导者”和“徐志国主义来领导”。夏永年，在肃反运动中，曾因散布反动言论受到审查和批判；但是，他不但不加悔改，反而怀恨在心，利用整风时期，向党进攻，诬蔑“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阶级是人为的”，全面的攻击肃反运动。

在大会上，青年科学工作者田静华、王传善以及动物学家郑国章和物理学家陆学善等同志系统地驳斥了这几个右派分子所说的“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谬论。他们指出，在解放前，科学事业只是反动统治的一个点缀品，几十年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和经费一直少得可怜，而且这些反动政客们为了给自己制造政治资本又故意在科学界中间制造派系门户之争，使得仅有的少数科学人才还不能团结起来进行研究工作。当时的镭学研究所，十多年来始终只有五个人，陆学善先生既是所长，又是唯一的研究员，还得兼任文书、会计、出纳、采购等事务工作。许多老科学家贫无立锥之地，终日只好为衣食奔走。青年学生大学毕业，大多数是失业；有研究工作，也因工资太少，无法维持饱暖，不得不放的虽有志于弃研究工作，另谋生路。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仅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已发展到66个，在其他产业部门、高等学校还有许多新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许多长期为我国科学研究中的空白薄弱部门，如原子能、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计算技术等研究工作已开始有了初步发展的基础。1956年较之1950年，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技术人员已增加了七倍多，研究经费增加了廿一倍。

科学工作者受到人民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照顾，生活安定了，能够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工作了。陆学善先生说：如果说科学工作需要阳光和空气，那么真正的阳光和空气是党的领导，科学有了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正、副所长钱三强、彭桓武同志在发言中更进一步指出：党对于科学的领导，是指出科学事业的发展方向，制订发展科学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动员各方面力量来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团结、教育和改造科学家，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所长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内行的，能够引导我国科学事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党，而不是别人。彭桓武同志又说：党领导科学，是走的群众路线，是依靠了和充分发挥了广大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1956年在党的领导下，集中数百位科学家的集体智慧，和取得苏联专家

的帮助，制訂了史無先例的我国科学技术十二年發展远景规划，就确切地証明了这一点。他們指出：右派分子以“党是外行”为幌子，企圖首先在科学領域內反掉党的领导权，然后进一步从整个社会上反掉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分子假意提倡什么科学家自己来领导。事实的邏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知識分子成为一个統治階級的时候，知識分子从来都是为这个或者为那个階級服务的。蕭何不能领导刘邦，賡房先生也决不能领导地主、资本家。很明显的，把党的领导赶掉了，上台的决不会是科学家，而是那般别有用心披着科学家外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們表示：广大的科学工作者是决不能上右派分子的当的，是会衷心的拥护党的领导的。

在批判右派分子对我国科学事業發展的社会主义路綫的攻击时，錢三强、田靜华等同志指出，右派分子所以強調科学研究工作上的个人志趣，反对服从国家需要；強調分散，反对必要的集中；強調無組織地进行研究工作，反对制訂科学研究工作的統一計劃，其目的是企圖把我国的科学事業引上资本主义的發展道路上去，企圖使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脫离实际，脫离国家建設需要，并且进一步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業的發展。

右派分子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进行的一系列恶毒攻击，在大会上也遭到徹底的批判而宣告破产。

陈謀礼和陈能寬同志揭露了右派分子提倡的“業務即政治”，“先专后紅”等口号，目的是要使得广大青年科学工作者脫离政治、脫离实际，使青年人不能分清大是大非，看不到真理和謬誤的客观标准。这样右派分子就可乘机崛起，以大知識分子身分出現，混淆黑白，夺取党的领导权。因此，“先专后紅”的实質，是“专而不紅”，最后还将墮落到“先专后黑”的泥坑里去。

刘后貼同志还指出：我們这一代青年都是从旧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而且大多数是出身于剝削階級或上層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因此就具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才是“存在决定意識”。这只能証明青年知識分子必須进行思想改造，而不是可以不要思想改造。新近才从野外回来的譚学奇同志代表中国科学院土壤調查队全体青年說：党一再教导青年要向困难作斗争，正是党的这种政治思想工作鼓舞了我們向田野、草原、荒山、沼澤进軍的積極性，使我們能够毫無怨言的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工作上的收获。因此，决不是像右派分子所說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損害了青年的心灵。我們所感到苦恼的是馬列主义学得太少，思想改造不够，科学水平不高，还不能滿足国家

建設的要求。但也正是在党的教导下，我們有信心和决心来克服困难，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業務能力。

右派分子在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時，还大肆叫喊要“独立思考”，誣蔑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教育的广大青年是“盲从者”。利广安和郭銓同志發言中对右派分子这个陰謀作了揭露和駁斥。他們說：右派分子企圖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面販賣资产阶级私貨，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絕對平均主义来腐蝕青年，瓦解青年們的革命意志，引导青年脫离党的教导，以便在思想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所以，在“独立思考”的幌子下，右派分子徐芻就散布起美国之音的謠言来了，右派分子何肇則宣揚說要用名利地位来“鼓励”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上进心”，右派分子項志遵竟然捏造大量事实誣蔑苏联。利广安同志說，党是一再教导我們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的。就在党章上还特別把發揮党员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規定为一种权利。我們和右派分子对于“独立思考”的看法有着根本分歧。我們認為必須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用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独立思考、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所以英勇奋斗，为人民革命事業而流血牺牲，正是他們独立思考的結果。而右派分子和我們恰恰相反，他們主張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場，以资产阶级思想偏見来“独立思考”。

对于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的問題，王礼立同志在發言中有力的駁斥了右派分子徐芻所捏造的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拉攏、收买”的謠言。王礼立同志憤慨地責問徐芻，要他睜眼看看全場四千青年知識分子有誰像他所誣蔑的是被党“拉攏、收买”过来的？要他問問那么多新近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科学家，又有誰是被党“拉攏、收买”过来的？孟宪振同志还談到了党是一貫地教育青年要虛心向科学家學習，要努力帮助科学家工作。他在發言中讀了一段以往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共青团組織給青年們作的报告，报告中說“党教育我們說，我們尊重科学家也是尊重科学，必須看到科学家的优点，只說他們的缺点或者一團和气都不是一家人的态度，團結科学家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說我們必須真誠地帮助他們工作，这是党交給我們的任务，党和人民的利益要求我們这样作。”他指出右派分子何肇是听过这个报告的，可是恰恰是何肇在違背党和共青团的教导，过去何肇就曾經因为無理和导师爭吵而受到团組織的严厉批評，可是何肇現在又来造謠說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間制造隔閡，攻击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可恶的團結”，这明明白白是何肇向党进攻的一炮！

在大会上，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張彭熹、刘玉芬和农民的子弟申昌淳同志，都以自己和家庭的亲身經歷

和广大工人农民在解放前后的实际生活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才得到解放，摆脱了过去悲惨的命运，获得了幸福的新生。把右派分子们捏造的人民遭受着苦难，党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等等无耻谎言驳得体无完肤。张彭豪从小做童工，父亲活活饿死了，全家七口最后只有一条棉被度日，受尽了饥寒的折磨和反动统治的迫害。解放后，生活日益改善了，他又得到进大学学习的机会，成为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这在解放前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申昌淳家中，解放前租用地主土地，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全部收成都被地主抢去作为地租和偿还高利贷了，全家只好忍饥挨饿，他自己又被送到城市里当学徒，继续遭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华侨青年科学工作者廖集仁同志也指出：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多少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流落到海外谋生，而在国外，华侨们又遭受外国统治者的歧视、欺凌和压迫，1948年新加坡就有大批爱国华侨青年被无理地关进集中营，一部分以后被送到台湾去当炮灰。只是在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才保护了华侨在海外的正当的权益，华侨子弟也才有可能回国，受到祖国的学校教育，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在会上，藏族青年科学工作者安世兴和达吉克族青年科学工作者谷力米尔代表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各族青年发言。他们用几年来西藏、新疆等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的改善，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说明了党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伟大的代表者，驳斥了右派分子徐芻、徐志国等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攻击。这些同志的发言，表示了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华侨、少数民族决不允許右派分子动摇党的领导的坚强的决心，与会的青年们都深深受到感动。

在大会上，许多同志还有力地驳斥了右派分子们反对苏联，反对肃反运动，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和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各种反动言论。留学苏联的钱皋颢同志以充分的事实说明了苏联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福利的提高。他说：苏联的政治是民主的。例如苏维埃代表必须定期和选民见面，选民们向代表提出对工作的各种批评和建议，重要的政治措施，都要进行全民性的讨论，譬如改组全国经济管理机构的措施，从三月份起就展开讨论，真理报每天都有一二版的篇幅发表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在五月份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他还说：右派分子往往也从否定苏联科学技术的成就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苏联科学技术的先进就连美国科学家也是承认的。美国有名的物理学家L. W. Alvarez在今年五月份的“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杂志上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实验室的设备在技术上是头等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那个680兆电子伏的回旋加速器

比美国所有的加速器都好。“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篇文章中也佩服苏联在一年内就可以使回旋加速器在工厂内成批生产，而美国要组织这个工作需要三年。去年苏联科学院院士Курчатов在英国哈威尔原子能研究中心报告了苏联研究可控制热核反应方面的结果，大大的震动了英美的原子核物理学界，其实这些实验结果苏联还是在1954年就完成了的。苏联的航空技术的飞跃的发展，连去苏联参观的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也不得不表示出乎意料之外，而现在苏联又制造成功了远距离的洲际导弹。他质问右派分子们为什么不承认这些事实。

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在关于民主、自由问题的发言中说：民主、自由不是抽象的东西，要看是什么人的，什么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劳动权利，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的民主和自由。美国所标榜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是少数资本家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自由，是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民主。不久前从美国留学回国的物理学家陈能宽同志说：我们召开四千人的大会，和右派分子进行大辩论，这是在美国从来都看不到也听不到的气魄伟大的民主。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张劲夫副院长和杜润生副秘书长都讲了话。

郭沫若院长庆贺大会通过充分的说理斗争，彻底驳倒了五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说：当前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严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这两条道路的问题，在历史上应该是已经解决了的。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为了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寻找过各种革命道路，经过许多次的流血斗争，最后才在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走苏联的道路。这样，中国人民终于打倒了三大敌人，取得解放。解放才八年，又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建设都取得惊人的辉煌成就。为什么右派分子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呢？这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垂死阶级的挣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党内或党外的，中央的或地方的，科学界或其他各界的右派分子，他们都是异口同声的：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对党有刻骨的仇恨，甚至公然叫嚣要杀共产党。郭沫若院长号召全体青年，对右派分子决不要有温情主义，要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张劲夫副院长在讲话中，强调要建立起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他说：在目前情况下，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种是维护私有制度、剥削制度，达到他个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的资产阶级

知識分子。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要求建立一強大的工人階級科學隊伍。因此，一方面要對廣大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一方面要積極培養新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現在舊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基本上消滅了，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投靠工人階級，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知識分子當他把自己的生命和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時，他就可以對社會主義專業作出積極地貢獻，可以充分發揮他的聰明才智使個人生命和勞動人民進步事業永遠存在。

張勁夫還說：青年人好像是初出山的太陽，正是來日方長。他們需要確定自己前進的方向，需要很好地學習，需要經過各種各樣的鍛煉。現在有的青年有了業務方向，但是還沒有明確的堅定的政治方向，這是很危險的。因為，政治方向是人的靈魂，如果迷失了政治方向，就必定會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犯錯誤，以至墮落到資產階級右派的泥坑里去。在舊社會黑暗的日子里，青年對於確定自己的政治方向，往往要靠自己去摸索，走彎路、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我們有了黨的領導。生長在這毛澤東時代，是最大的幸福，可以避免由我們自己去暗中摸索了。所以，我們應當忠實地接受黨的領導，下定決心，全心全意地為工人階級、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吳明瑜〕

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 第二次全體會議

去年6月，中、蘇、朝、越四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太平洋西部漁業、海洋學和湖沼學研究的合作協定”，成立了“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它的任務主要是促進締約各國在海洋和淡水漁業有關的研究方面進行各種的合作。委員會下設海洋漁業、海洋學、淡水漁業及湖沼學、漁業資源保護等四個專業組；委員會的常設工作機構、秘書處設在北京。去年，在委員會成立後，就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

今年8月15—21日，在蘇聯首都莫斯科召開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我國出席的代表團包括許德珩（委員會主席）、童第周（委員會秘書）、伍獻文（委員）和委員會專家赫崇本、朱樹屏、曾呈奎、馮樂進、鄭恩綬以及工作人員共11人。朝鮮代表團由5人組成，越南4人，蘇聯方面參加會議的除了委員會的成員外，還有各地科學家共約40人；蒙古科學家一人也

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會議。

會議於8月25日開幕，由許德珩主席致開幕詞，童第周教授作了關於委員會及秘書處一年來的工作總結報告。委員會付主席、蘇聯全蘇海洋漁業及海洋學研究所副所長П. А. 莫伊謝也夫教授作了“論太平洋西部漁業的生物學基礎”的報告。以後三天，大會按淡水及海洋兩大組分別進行了論文報告及討論。在會上宣讀的論文共有30篇，其中蘇聯17篇、朝鮮3篇、越南2篇、蒙古1篇。中國共提出論文和資料共8篇，即：“中國沿岸的表面海流與風的關係的初步研究”、“梁子湖的自然環境及其漁業資源問題”、“青海湖的類型、演變及其生物生產力的初步研究”、“中國的海帶養殖和海带研究概況”、“草、青、鮭、鱸的飼養方法”、“煙台威海衛鮭魚漁場調查初步報告”、“中國海洋漁業生物學基礎”及“北部灣中國海洋漁業概況”。各國對中國的報告感到很大興趣，提出問題及討論都很熱烈。

最後，會議除了通過委員會的會章等文件外，還討論並通過了今後各國在漁業科學研究方面進行合作的建議，希望在海洋漁業調查、水庫漁業利用問題、黑龍江漁業的生物學基礎的研究等各个方面進行合作，並交換科學家及圖書資料等。

在會前及會後，各國代表團曾在穆爾曼斯克、列寧格勒、基輔、巴庫、阿斯特拉罕、斯大林格勒、海參崴及莫斯科等八個城市進行專業性的參觀。我國代表團對這些地區內的漁業科學研究機構、漁港、加工廠、漁業學院等進行了了解，得到了一個關於蘇聯漁業研究機構、生產企業和專科學校情況的較全面的概念。

〔章宗涉〕

短 訊

經國務院批准，中國科學院最近建立了以下一些機構：民族研究所籌備委員會，由劉春任主任委員；原實驗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組改建為北京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是貝時璋；原古脊椎動物研究室改建為古脊椎動物研究所，由楊鍾健任所長；原動物研究室改建為動物研究所，所長是陳桢，副所長是劉燾非；原海洋生物研究室改建為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是童第周，副所長是曾呈奎、張璽和孫自平；以原菌種保藏委員會為基礎，建立了北京微生物研究室，由方心芳任研究室的副主任。